



稻鄉出版社印行

# 戰後初期 (1945-1949)

## 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

徐秀慧◎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 與文學思潮

徐秀慧◎著

國立編譯館主編  
稻鄉出版社印行  
九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國家圖書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 徐秀慧

著 --初版-- 臺北縣板橋市：稻鄉，2007〔民96〕

面；21公分

參考書目：面

ISBN：978-986-6913-23-5（平裝）

1. 臺灣文化 2. 文化政策 3. 臺灣文學 4. 二二八事件 5. 臺灣  
光復

733.409

96021757

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

作 者：徐秀慧

主 編 者：國立編譯館

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79號

電話：(02) 3322-5558

網址：www.nict.gov.tw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印 行 者：稻鄉出版社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53巷28號

電話：(02) 22566844、22514894

傳真：(02) 22564690

郵撥帳號：1204048-1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四一四九號

定 價：新台幣500元

初 版：中華民國96年11月

G P N：1009603378

ISBN：978-986-6913-23-5

著作人：徐秀慧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 本書保留所有權利。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書面授權，  
請洽國立編譯館。

# 施 序

施 淑

目前有關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社會歷史的研究中，研究者大都會把焦點放在二·二八事變及其發生背景，認為這對台灣造成巨大影響的悲劇事件肇因於陳儀集團統治上的諸多弊端。如政治上因差別待遇，大陸人壟斷權位，結黨營私，經濟上因官僚腐敗，貪贓枉法，民不聊生，生活方面則是台灣的現代化社會相對於大陸的封建落後。在這之上，扮演關鍵作用的是入主台灣的大陸人，以勝利者的傲慢和統治者心態在語言、文化及生活各方面歧視台灣人，指責經過日本殖民的台灣人有奴化意識，從而形成省籍對立及社會分裂，於是引發了二·二八大動亂及隨之而來的白色恐怖。以上觀點，雖因研究者立場，在輕重取捨上有所差異，但大致形成了理解戰後初期台灣歷史的基礎，只不過有關省籍對立現象，因近年來政治生態的變化，在後續研究著作裡已逐步演化和擴大為族群矛盾和民族認同的問題。為了釐清歷史真象，徐秀慧女士的新著《戰後初期（1945~1949）台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提出了頗具參考價值的思考方向和探索視野。

不同於前此研究之把光復後台灣情勢孤立起來討論，本書作者由台灣復歸中國時，國共內戰與形成中的世界性冷戰結構，加上台灣施行「特殊省制」的不自然的現實條件，考察在這政治及思想格

局下，延續大陸權力結構的官方政治派系與民間不同利益背景的知識分子，在戰後五年的台灣文化場域中的複雜的權力角力，由之還原光復後社會重組及文化重編過程中的歷史情境與社會場景。

根據相關資料的仔細梳理，本書作者著重分析向來被研究者忽略的本地及大陸來台文化人，對立於國民黨獨裁的黨國體制的「民主論述」的發生和發展。指出此一時期起帶頭作用的文化活動及文化抗爭的焦點在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要求，而非民族矛盾或民族認同問題。因此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原因，除了政治經濟方面的倒行逆施，省籍隔閡與對立，還應考慮普遍存在於當時文化界的民主思潮及與之相應的現代意識和現代性的追求。這股力量包含有日據時代的台灣進步仕紳與文人，被稱為「半山」的部分返台文化人，陳儀政權裡的開明知識分子，大陸來台的左翼人士。如果不考量這一社會力的作用，將無法解釋緊隨二·二八事變後的白色恐怖，對不分省籍的左翼人士與自由主義者的肅清迫害及恐共反共的戒嚴體制的產生。

結合上述對文化場域複雜的政治社會力分析，在文學思潮方面，本書由二·二八事變工、農、一般民眾介入不深，民主抗爭陣營因成員複雜，內部分化，以致改革及革命力量分散，加上語言轉換等主客觀因素，論述它們對文藝領域的影響。對此，作者指出日據時代台灣社會主義思想雖在戰後迅速復蘇，但因上述主客觀因素，作為國共內戰和民間民主要求的延長線的文藝思想論爭，雖曾在繼承五四及日據時代反帝、反封建的文學精神的前提下，提出人民文學、文學大眾化、新現實主義等主張，卻在「台灣新文學建設」及有關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的「一般性」與「特殊性」的實踐問題

上，莫衷一是，爭持不下，如同二·二八前文化界的民主論述般，在國民黨強大的黨國文化資本操控下，以社會主義文藝思潮的頓挫及現代性文學理念的中斷，為戰後五年短促的文學里程劃上句點。

綜觀徐秀慧女士這本由博士論文修訂而成的著作，當不難發現她在論述分析問題時的客觀態度和批判性思考。相信這部著作對理解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及文化生態應有一定的幫助，對相關問題的後續研究也有參照和啟發的作用。忝為論文指導者之一，爰綴數語於書前，並以爲序。

# 呂 序

呂正惠

秀慧的博士論文，經過修改以後，就要出版了。她希望我寫一篇序，我當然不能推辭。施淑教授的序裡，已把秀慧論文處理問題的特殊方向——它和流行看法之間的差異——講得扼要而明白，因此我想談一談秀慧論文寫作過程中的一些問題，以供大家參考。

秀慧的碩士論文研究黃春明的小說。她以班雅明的“說書人”理論作參照，說明黃春明前、後期小說的變化，而不是把小說資料全部納入理論架構之中。我認為，她的碩士論文還算相當活潑而有一些創意。

就在她進入清華大學研讀博士期間，我的朋友曾健民醫生跟我說，他搜集了一大批光復初期的資料，是否可以找到一個博士生就此寫一篇論文。我想到秀慧，就找她來談。她原來已有題目，而且開始準備了。如果改變題目，她就必須面對一些非常龐雜的歷史資料，而且還要面對一個她幾乎完全陌生的年代。她當然心生畏懼，不願意接受，這完全可以理解。經過我幾度說服（或強迫），她勉強同意了。

秀慧剛開始閱讀這一批資料時，即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不知從何整理起。她跟我說，她想按年、月、日先編一個大事紀，以便自我釐清。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她又跑來說，編不下去，事情太多了，

不知如何選擇。我告訴她，當我們還沒有把資料全盤加以理解、當我們對全局還完全模糊不清時，你是完全無法作選擇的。我們只能先大體閱讀資料，得到一個非常粗糙的整體觀，然後每對資料再熟悉一步，整體觀就會清楚一些。我們必須在資料與整體觀之間不斷往返，“辨証發展”，最後才會得一個過得去的時代圖象，這個時候才有資格談到擬定論文大綱。

據我了解，現在很多人寫論文，才剛開始看資料，大綱已經先擬好了。因為她以某一“史觀”或理論作引導，大綱據此而定，並按此大綱找資料。實際上，這等於還沒看完資料，結論就已差不多得到了。不少研究生跟我說，沒有理論，就無法寫論文，實際上卻是，他以理論所預設的架構來看問題。秀慧對那一大批資料、對資料所涉及的時代都不熟悉。她被迫從資料入手，反覆閱讀、思索，由此反而讀出自己的看法，可謂因禍得福。

當秀慧已經比較熟悉資料，對當時的一些事件比較可以掌握以後，她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按當時台灣文學研究界的流行看法，她自然“先天”具有省籍對立與台灣、中國對立的模糊觀念（她不是台獨派，但無法不受台灣風氣影響）。這種先入的看法和她的資料常常“打架”，無法完全協調。每當她要解釋一些事件時，先入觀念即不時出現，讓她左右為難，不知如何處理。這時候我只明白點出，她必須拋棄先入觀念，不然她的論文會寫不下去，但我完全不幫她釐清。我認為，我無法幫她“清除”她的先入觀念，如果她自己都無法“清除”，這些觀念會不知不覺滲透到她的論述中，神仙也幫不了忙。事後據其他學生說，秀慧跟他們發牢騷，抱怨我一點也不“指導”。事實上，“思想”無法在別人的“指導”下改

造，只能在別人的幫助下，“自我改造”。從我的立場來看，秀慧的“自我改造”並不徹底，但目前已達到的地步，我已認為非常不簡單了。

現在的研究者侈談“歷史語境”，其實大半沒有意識到資料所呈現的“歷史語境”和自己的先入觀念往往會產生矛盾。應該說，沒有一個“歷史語境”和自己的先入觀念是完全相同的，但一般研究者卻只以自己的先入觀念去詮釋資料，完全沒有意識到，有一個他需面對的、陌生的“歷史語境”。我們天天在“以今律古”，卻又天天在談“語境”。秀慧比較幸運，她的資料所呈現的“歷史語境”是一面陌生的高牆，她不得不面對。當然也要說，因為她認真閱讀資料，因此那一面高牆自然出現在她眼前。如果是先入觀念去讀資料，高牆也就不會出現了。

秀慧論文的完成，不少人幫過她的忙，如曾健民、日本的橫地剛、跟我聯合指導的施淑教授，以及她的一些同學。以上我只是就我個人的經驗，提出一些值得思索的問題。秀慧在作學問上如果還可求進步，就應該記住這一次的過程，而不只是滿足於這一篇頗受讚許的論文。這是我對秀慧的期望。

二〇〇七、八、四

# 目 錄

|                                    |     |
|------------------------------------|-----|
| 施 序.....                           | i   |
| 呂 序.....                           | v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 1   |
|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 5   |
| 第二章 「回歸中國」與台灣政經社會的危機.....          | 35  |
| 第一節 國民黨政府的接收與政治轉型.....             | 37  |
| 一、光復前史：台灣人的「光復運動」與長官公署特殊省制的制定..... | 38  |
| 二、台灣人對光復的期待與失落.....                | 48  |
| 三、政治上的差別待遇與地方自治的實施.....            | 54  |
| 第三節 中央、長官公署雙重經濟「接收」與台灣的貧弱化.....    | 69  |
| 一、統制經濟與公營企業.....                   | 73  |
| 二、台幣政策與通貨膨脹.....                   | 80  |
| 第四節 從二·二八事件到美軍協防.....              | 88  |
| 一、島內整體社會危機與二·二八事件的爆發.....          | 88  |
| 二、冷戰與內戰交迫局勢下成為「反共」堡壘.....          | 98  |
| 第三章 權力場域的結構與自主性文化場域的生成.....        | 107 |
| 第一節 「長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保守/民主」的縫隙..       | 109 |

|                                  |     |
|----------------------------------|-----|
| 第二節 官方報刊的勢力角逐與民主文化人的介入 .....     | 128 |
| 第三節 民間報刊雜誌的人脈與政治傾向 .....         | 154 |
| 一、《民報》與《人民導報》的成員與理念 .....        | 156 |
| 二、左翼文化人主導的雜誌 .....               | 165 |
| 第四章 左翼言論、民主思潮與二·二八事件的革命困境 ...    | 189 |
| 第一節「三民主義」與社會改革意識 .....           | 190 |
| 第二節 國內政治動向與台灣政治出路 .....          | 204 |
| 一、批判島內的政經現實 .....                | 206 |
| 二、響應大陸的政治民主化要求 .....             | 211 |
| 三、圍繞「政治協商會議」展開的民主要求 .....        | 223 |
| 第三節 殖民地的傷痕：二·二八事件與台灣文化的侷限性 ..... | 235 |
| 第五章 二·二八事件前台灣文化的重建與「魯迅熱」 .....   | 251 |
| 第一節 龍瑛宗之「科學的世界觀」與台灣文化重建 .....    | 252 |
| 第二節 「魯迅戰鬥精神」的繼承與其文化抗爭的意義 .....   | 273 |
| 第六章 二·二八事件後的文學思潮 .....           | 309 |
| 第一節 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一般性」 .....       | 310 |
| 第二節 社會主義文藝理念的復甦與中挫 .....         | 343 |
| 一、「人民文學」、文藝大眾化的倡議 .....          | 344 |
| 二、從「五四精神」到「新現實主義」論爭的意義 .....     | 356 |
| 三、官方意識形態主導的文藝論調與整肅運動 .....       | 371 |
| 第七章 結論 .....                     | 381 |
| 附 錄 .....                        | 393 |

|                     |     |
|---------------------|-----|
| 參考書目.....           | 439 |
| (一) 報紙 .....        | 439 |
| (二) 雜誌 .....        | 440 |
| (三) 引用期刊論文、書目 ..... | 442 |
| 後記.....             | 475 |

# 第一章

---

##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化研究近年來日漸受到重視，起因於台灣當前的「政治認同」，從而影響台灣文學史的定位與分期的問題，首先對此一研究軌跡稍作回顧後，以提出我的問題意識。

七〇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失去代表「中國」的正當性，引發「台灣主體」的重新思索，也展開了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的尋根熱，同時開啓台灣文學的研究風氣。相應於出版業著手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出土，學院裡台灣文學的研究也蔚為風潮。1987年2月，葉石濤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如今看來，則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大有為台灣文學定調之勢。日後的研究者大抵以《台灣文學史綱》按圖索驥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基本上不脫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在這之前的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陳映真曾經針對葉石濤的文學史觀具有「分離主義」的傾向提出異議。陳映真的觀點雖然有《夏潮》雜誌系統的人士，在八〇年代初「中國結」與「台灣結」的論爭中繼續闡發（有關此一論爭可參考施敏輝（陳芳明）編：1995），日後在學院裡也有王曉波、呂正惠等人的呼應，但在「本土化」的要求聲浪日漸高漲的社會情勢下，葉石濤的文學史觀

還是出現比較多的後繼者。隨後各大學院紛紛開設台灣文學相關的課程，日據時期的學位論文，至今已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九〇年代以後，在現有的台灣文學研究基礎上，重新編寫一部更細緻更深入的文學史的呼聲日益高漲。千禧年，代表台灣本土政治勢力的民進黨執政，「台灣文學」、「台灣語文教育」系所在各大專院校的設立也進入高潮期。陳芳明撰寫的「台灣新文學史」在《聯合文學》連載一年後，2000 年的夏天，陳映真與陳芳明爲了台灣社會性質與文學史觀的問題，尤其針對陳芳明定義台灣文學史的分期：從「1945 年國民政府的接收台灣，到 1987 年戒嚴體制的終結」爲「再殖民時期」<sup>1</sup>（陳芳明 1999：164、2001a：151～153），展開了持續一年多的長期筆戰。引人注目的是兩人面對戰後初期同樣的文學史料，卻有南轅北轍的歷史解釋。這場文學史觀的筆戰，其實是八〇年代「中國結」與「台灣結」論爭的延續，牽涉的是台灣社會甚囂

---

<sup>1</sup>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歷經三個階段的發展：「第一個殖民時期」（1895～1945），「再殖民時期」（1945～1987）以及「後殖民時期」（1987～）（陳芳明 1999：164）。陳芳明指出：「來台接收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無論在權力結構或組織規格上，都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政治的特殊化加上經濟統治政策，形成「高度的權力支配的形式，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的時期。也正是透過政治與經濟的雙重箝制，戰後初期的文化霸權論述終於能夠次第建構起來。」，又說：「從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架構來看，戰後初期台灣社會的文化支配就已形成，一方面是中原/中心文化，另一方面是邊疆/邊緣文化；一方面是中國化的優勢，另方面是被奴化的劣勢。陳儀政府利用國家權力與文化權力的重疊關係，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主義式的控制。日本殖民體制誠然已經消失，但是帝國文化與衛星文化的關係並沒有因國民政府的接收而產生變化；相反的，這種宰制的結構強化而鞏固。」因此他提出：「必須從再殖民時期的觀點來看戰後初期的台灣文學，才能夠理解當時台灣作家的心裡深層結構」。（陳芳明 2001a：151～153）

塵上的民族認同的論爭。這場文學史觀的筆戰，說明了台灣文學的研究，各方的注意力已從日據時期的文學尋根逐漸擴大到其他時期的研究，尤其是對於戰後初期的文化研究，繼九〇年的熱潮，儼然有持續加溫之勢。

筆者在閱讀前人的研究文獻時，發現大多數的研究往往侷限於孤立台灣情勢，而忽略了戰後台灣復歸中國，在國共內戰的局勢下，台灣受制於內戰情勢的影響，同時也受制於世界性冷戰結構形成期間國際情勢的影響。因此研究此一時期的台灣文學，除了研究國民黨政權的接收，還不能避談當時左翼思潮的影響。葉石濤在九〇年代初還曾說過：「光復初期的知識份子最大的心理癥結，並非現實的統獨之事，而是馬克思主義的蔓延」、「絕沒有分離主義的傾向，倒有左傾思想卻是事實」（葉石濤 1991：20）。葉石濤這段親身經歷的歷史証言，卻常常被其後繼者所忽略，而從統獨的角度去詮釋戰後初期的文學思想。因此我們有必要回到當日的文化情境，探索文化人左傾的歷史、社會與心理等等因素。首先令我疑惑的是從日據時期的社會、文化研究中，幾乎都不避談社會主義的思潮與藝術表現，但到戰後初期這部分卻突然被「噤聲」一般，或僅剩一連串的「犧牲就義」事蹟，對於行動者的動機，必須聯繫到整體社會文化思想的討論，截至目前為止，缺乏全面的考察。甚至許多研究焦點因圍繞二·二八事件，往往從「身份認同」的問題意識出發，掩蓋了二·二八事件中「社會改革」的訴求。包括筆者一開始接觸這個時期的文獻史料時，也是希望能釐清當時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在「政權轉換」之際面臨了什麼樣的轉折。但當筆者深入史料之後，隨即發現這個問題雖然困擾著當時的文化人，但更多的時候，「台

灣的出路」問題是與「社會改革」、「民主體制」建立、「反內戰」與和平建國等問題相聯繫的，這使我不得不重新調整我的問題意識。

有關戰後初期的文化研究，因牽涉到戰後台灣「認同政治」的議題，往往成為歷史解釋權的爭奪戰。但若是訴諸自身先驗的身份認同的詮釋，一味帶著當下「民族認同」的意識，去追問對戰後初期文化人而言還不構成現實的問題，如此面對歷史的態度不免粗疏。因此，唯有放下眼前「民族認同」的爭議，深入爬梳戰後初期社會文化思想的脈絡，才能對當時文化人的處境與抉擇有深刻的理解，也才能得到以史為鑑的契機，否則我們恐怕還是與這段與我們當今的處境息息相關的歷史錯身而過。經過一段時間的蒐羅，筆者發現戰後初期許多文化史料確實有待耙梳，才能掌握知識份子如何因應政局的演變，將「台灣的出路」的問題投射到「重建台灣文化」的思維上。本書的動機即在釐清戰後初期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權力場域對文學生產的影響，分析戰後初期報刊、雜誌所形構的文化場域，以及作用於此一文化場域的國民黨派系政治與知識份子、人民團體之間各方勢力的角力；藉此探究文化人在文化場域的介入與實踐，以及它們和官方文化宣傳的意識形態或重合或對抗的內容。在此基礎上，再進一步探討與文化人的社會、文化實踐相應的文學思潮，以及兩岸文化人如何重估、繼承日據時代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文化資產，如何與戰後的現實處境對話，他們對台灣文學的性質與方向的討論呈現出怎樣的歷史意義？

對這些問題的釐清，首先將有助於理解戰後初期的文化人，在尚未經過後來國民黨官方意識形態壓制時，他們如何對日本殖民地

時代的文化遺產進行評價，如何思索台灣文化的主體性與現代性的問題；其次將有助於對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結構性社會因素有更清楚的認知。筆者希望這對台灣文學的定位，或影響文學史分期的社會性質問題，能發揮一些澄清紛爭、分歧的可能性。

## 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研究方法

首先回顧目前涉及戰後初期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的成果，再提出我的方法論。

針對戰後初期文學內在發展的研究，始於《文學界》雜誌出土一系列光復初期的作品而伴隨刊出的評論文章，包括：葉石濤的〈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光復初期的日語文學〉（《文學界》9，1984），林梵（林瑞明）的〈讓他們出土〉與彭瑞金的〈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文學界》10，1984）等三篇論著。葉石濤在評論《中華日報》龍瑛宗主編日文欄「文藝」副刊的日文作品時，已初步提出他對「光復初期」的文學評價：「（台灣作家）從戰爭的重壓下復甦，極欲繼續完成他們未完的事業——建立富於本土色彩的文學躋身世界文學之林」（葉石濤 1984：3）。林瑞明對《台灣新生報》「橋」（下文簡稱「橋」）副刊上的省籍作家的小說選刊作了導論，肯定主編歌雷「識見深遠，鼓勵台灣作家創作，對當時的文學運動，有不可抹滅的貢獻。」（林瑞明 1984：215），並花了相當的篇幅分析葉石濤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的小說〈三月的媽祖〉。彭瑞金綜論了「橋」副刊論爭的來龍去脈，並綜括這段論爭：「省內外作家一致服膺『新現實主義』，主張『人民的』文學，